

〔清〕孔尚任 顾彩著 ● 戴胜兰 徐振贵校注

小忽雷

传奇



小 忽 雷 传 奇

〔清〕孔尚任 顾彩 著
戴胜兰 徐振贵 校注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华光 III 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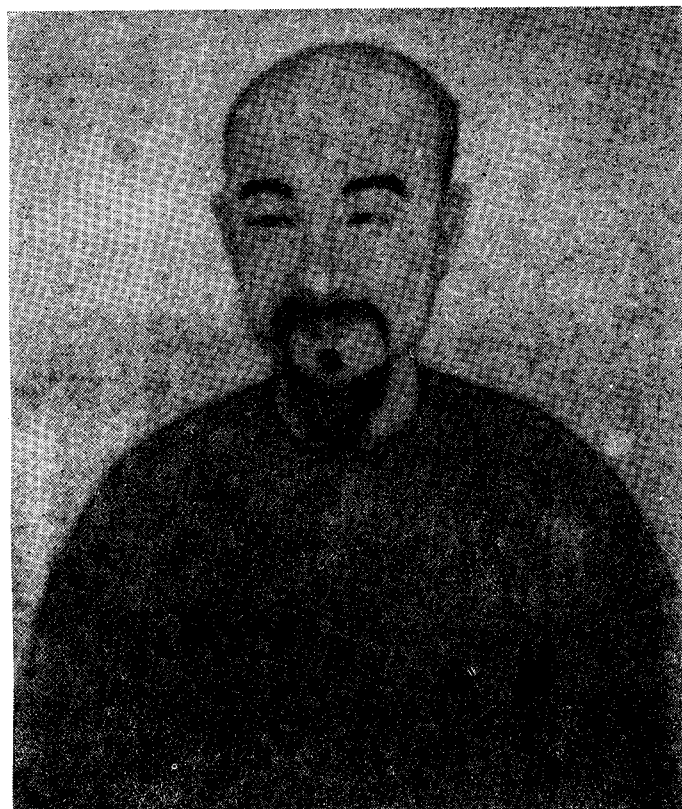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4 插页 188 千字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198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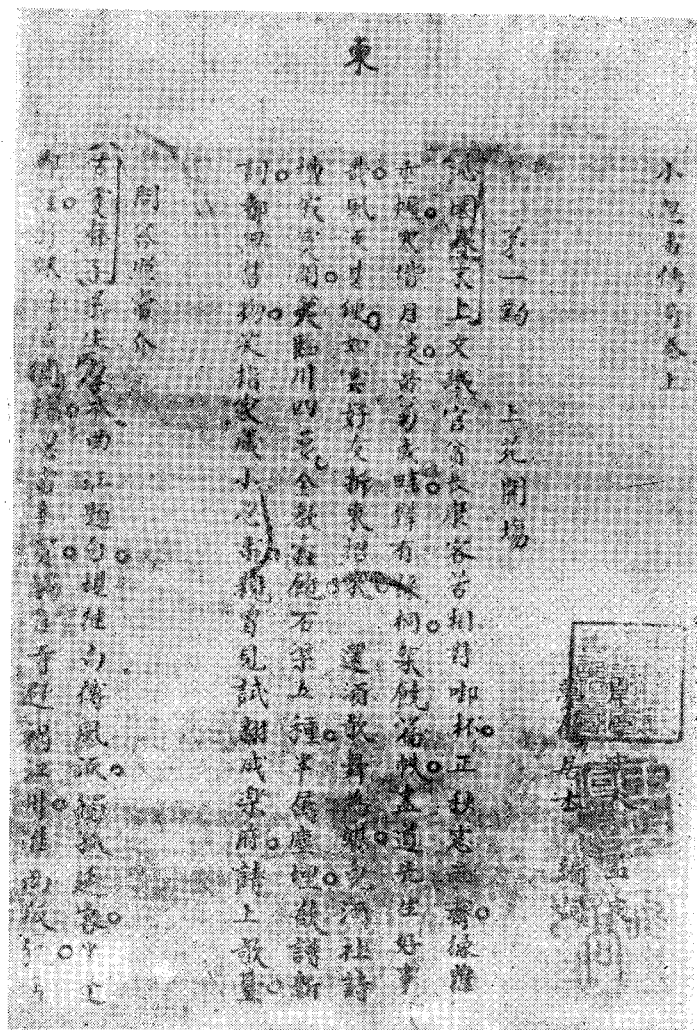
印数 1—10,000

ISBN 7—5333—007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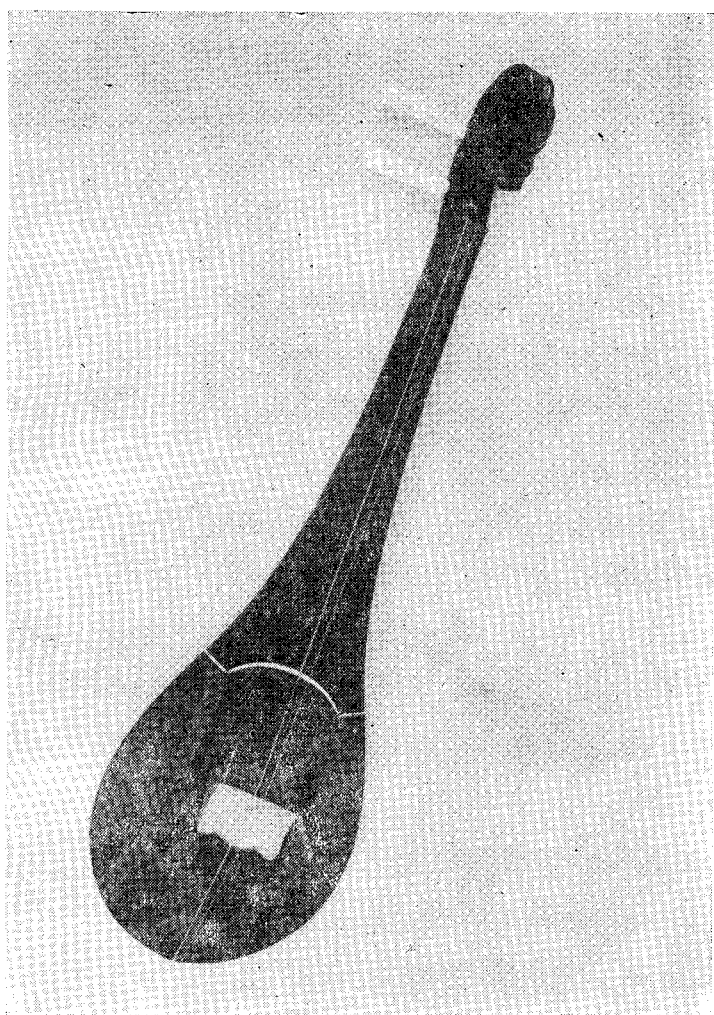
I·35 定价: 3.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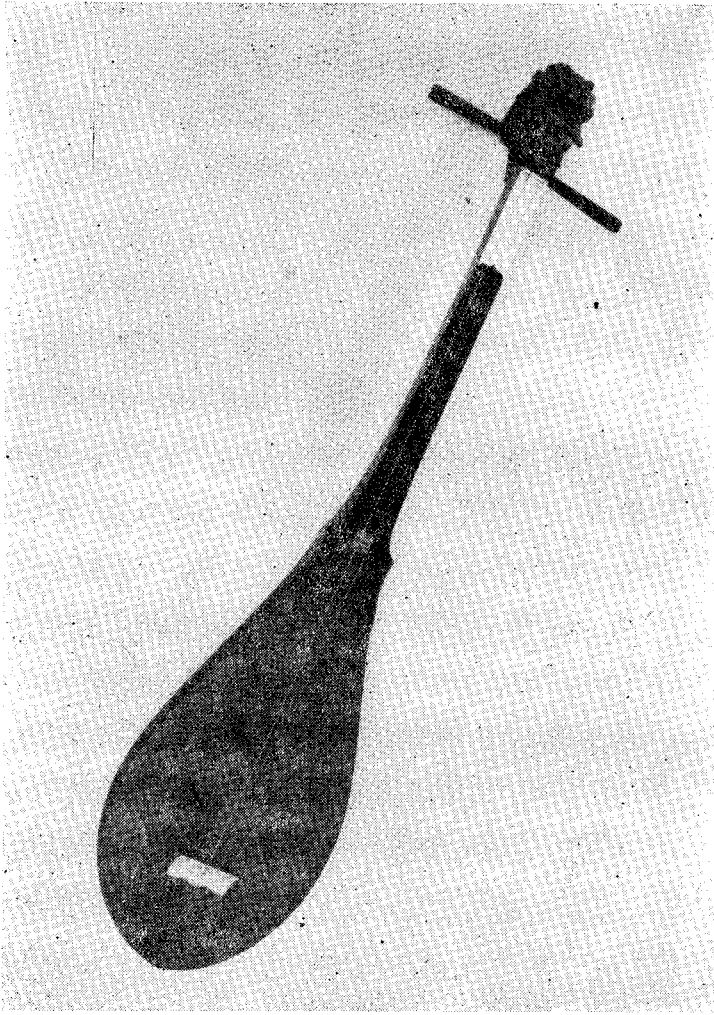
孔尚任画像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清抄本《小忽雷传奇》书影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唐制小忽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制大忽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前 言

《小忽雷传奇》(以下简称《小忽雷》)在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就已经由作者孔尚任和顾彩写成,比孔尚任的《桃花扇》脱稿还早五年。但刘世珩得到《小忽雷》抄本,校订刻印,编为暖红室汇刻传奇第二十四种问世,却已是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比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即已付梓的《桃花扇》晚二百多年。这主要是因为就思想意义及艺术价值而论,《小忽雷》比《桃花扇》有所逊色。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小忽雷》知之不多,对其作者之一的顾彩也较为隔膜。

顾彩,字天石,号补斋,别号梦鹤居士,无锡人。擅诗文,工音律。曾“流寓曲阜,衍圣公毓圻馆之。素矜名节,耽吟咏。三十年中,或之燕赵,或之楚粤。天下之风俗,无弗识也;古今之人物、事变,无弗悉;而应世之经权,无弗通也。当代名公巨卿,罔不折节交之。然不屑屈志权要,以乞援引。诗,得力于李、杜、昌黎”^①。可见,是一位博通古今、交游甚广、厌恶世俗的有志之士。著有《往深斋集》、《后琵琶记》、《楚辞谱》、《南桃花扇》。

康熙二十八年清明前夕,正在淮扬治河的孔尚任与顾彩结识,但只是萍水相逢。从康熙二十九年孔尚任回京继任国子监博士到康熙四十一年因罢职返乡,其间十多年,彼此交往日渐

频繁。仅见于孔尚任《长留集》中记述彼此交往的诗歌就有十五首之多。孔尚任家居期间，顾彩为衍圣公孔毓圻座上客，两人更不时聚会，相互唱和，感情颇为融洽。其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彼此思想认识上的志同道合。孔尚任治河中，“不胜劳且苦”^②，但回京后相当长时间，并未加官晋爵，仍是“博士庭前老荠花”^③，而且还间或遭受达官权贵冷遇，故而名利之心日渐淡薄，对“冠裳如蚁等”^④的宦海浮沉，对“鲁冠常弃溺”^⑤的现实，心怀愤懑，不时发些“难与轻肥人，朝市争先后”^⑥的牢骚。而顾彩也是“素矜名节”，“不屑屈志权要以乞援引”之士。因此，彼此在厌恶世俗不满现实的基础上结为“知心”。同时，他们都爱好并致力于写作戏曲。孔尚任还京后，为修改《桃花扇》，不时到太平园去看戏。其中就看过顾彩写的《楚辞谱》，并写诗道：“顾郎新谱楚词成，南雅清商绝妙声”^⑦。对顾彩作曲填词之妙早就耳闻目睹。因此，在得到唐朝乐器小忽雷并打算写一传奇剧时，便自然想到，自己不如顾彩熟悉宫商，独自写作，“恐不谐于歌者之口”^⑧，还是二人合作为好。“于是，孔门星座，立传周详；顾氏仙才，填词雅秀”^⑨。“一时刻烛分笺，叠鼓竞吹，觉浩浩落落，如午夜之联诗”^⑩。可知《小忽雷》实为两人合谱，是以“分笺联句”的方式相互补助，很难确指某部分只为谁氏所作。不能将著作权归于一人。诚如孔尚任《致张山来札》云：“《小忽雷》一种，乃与天石合编者。”

二

康熙三十年，孔尚任于京都“典衣”购得一把古琴，名小忽雷。此器来历不凡，钱易《南部新书》中曾有记载：“韩晋公在

朝，奉使入蜀。至骆谷山椒，巨树耸茂可爱，鸟鸟之声毕异。下马，以探弓射其颠，枝柯坠于下，响震山谷，有金石之韵。使还，戒县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干，载以归。召良匠斫之，亦不知其名。坚致如紫石，复金色线，交结其间。匠曰：‘为胡琴槽，他木不可并。’遂为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乐，遂献。大忽雷入禁中所有。小忽雷在亲(崇)仁坊里。”至于小忽雷何以在亲(崇)仁坊里，以及由于此器何以又引出一段传奇故事，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谓：“文宗朝，有内人郑中丞，善胡琴。内库有二琵琶，号大、小忽雷。郑尝弹小忽雷，偶以匙头脱，送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赵家最妙。时有权相旧吏梁厚本，有别墅在昭应县之西，正临河岸。垂钓之际，忽见一物浮过，长五六尺许，上以锦绮缠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秘器也。及发棺视之，乃一女郎，妆饰俨然，以罗领巾系其颈。解其领巾，伺之，口鼻有余息，即移入室中。将养经旬，乃能言，云是内弟子郑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内官缢杀，投于河中。锦绮，即弟子相赠尔。遂垂泣感谢，厚本即纳为妻。因言其艺，及言所弹琵琶，今在南赵家。寻值训、注之乱，人莫有知者，厚本赂乐匠赎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轻弹。后遇良辰，饮于花下，酒酣，不觉朗弹数曲。洎有黄门放鹞子过其门，私于墙外听之，曰：‘此郑中丞琵琶声也。’翌日，达上听。文宗方追悔，至是惊喜，即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锡赐焉。”这段传奇故事，显然是一绝好戏剧题材。于是，作者以此为据，创作了历史剧《小忽雷》。

剧中，以梁厚本、郑盈盈之间的爱情波折做为线索，有机地穿插了中唐后期元和、太和年间的重大历史事实，如平淮蔡、甘露之变等。将当时大臣如裴度、权德舆、李训、郑注，宦官梁守

谦、仇士良，文人如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等都派作了剧中人物。而且，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点染，构成了梁厚本、郑盈盈与宦官仇士良之间波浪迭起的矛盾冲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唐后期朝政腐败、权奸当道、忠良受害、贤士蒙冤的黑暗现实，对祸国殃民的权奸特别是宦官集团进行了有力抨击与鞭挞，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宦官仇士良。

仇士良是一个奸恶狠毒、飞扬跋扈的宦官头目。攫取高官厚禄是其全部言行的枢纽，而狐假虎威、媚上压下则是他实现其狼子野心的根本手段。所以，他对皇帝的荒淫纵乐推波助澜，与其亲信所说“咱们内官家，答应万岁爷，并不消治国安邦的道理。只是炼些长生药，合些采战方，迎合他老人家的意思，便是功劳了”^①，就是他媚上之术的自我招供。因而抢得小忽雷进献，“天颜大喜”^②，便升为左街功德使；广选美女，并以小儿心肝合成春药进献，即可左右朝政，便是这番自供的最好注脚。而对忠良贤士却残酷剿杀，无所不用其极。当众抢掠，毒打梁生是其凶残本性的初露；毒计陷害权相，抹煞梁生军功，将其“置于死地”^③，则是其扼杀贤才的变本加厉；缢杀盈盈投尸御河，是其诛连无辜的兽性发作；而甘露之变中“索性把满朝文武杀个绝尽，也教天下晓得咱老子的辣手”^④，则是其狰狞嘴脸的凶相毕露。作者就是通过这一系列典型情节，深刻揭露了仇士良的狠毒残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宦官专权的唐代社会现实。唐代宦官专横，由来已久。玄宗时，已重用宦官高力士。一些文武大臣附会其骥，“因之而将相高位”^⑤，是为唐代宦官专权之滥觞。安史乱后，以迄唐亡，宦官气焰益发嚣张，从亲掌禁军，到任监军使、枢密使、宣徽使，军政大权，萃于一身，非但操纵中央，甚至能任意废立皇帝。中唐以来诸帝，

从肃宗起，除哀帝外，余者皆为宦官拥立。顺宗、宪宗、敬宗、文宗皆死于宦官之手，昭宗也曾被宦官囚禁。宦官把持朝政是唐代后期政治腐败的重要特点。仇士良就是这样一个把持朝纲、无恶不作的阉宦奸佞。

然而，孔尚任之所以要揭露中唐后期宦官专权弊政，却绝非仅限于“足觐唐室之兴衰”^⑩，而是要借梁、郑的“伤心遗事”，道出自己的“万恨千悲”^⑪，即痛恨权奸误国，悲叹南明复亡。因为南明政权是由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阉党余孽阮大铖狼狈为奸，联合四镇军事头目而建立的，是一个极其昏庸腐朽的封建小朝廷。当清军日趋逼近南京，南明已朝不保夕时，弘光却仍是逐酒征歌，饮欲终日，“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不以节，国用匱乏。”弘光酒后，“淫死童女二人，乃旧院雏妓，马、阮选进者。抬出北安门，付鸩儿葬之。嗣后屡有此事。由是曲中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而马、阮搜觅六院，亦无遗矣”^⑫。简直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而且，朝廷内部争权夺利之争，愈演愈烈。大悲陷狱，童妃惨死，慈娘投监，冤案不断。其属下贪官污吏、跋扈武将，更是有恃无恐，为非作歹。而进步社团（如复社）文人，锒铛入狱，惨遭杀害。因此，只一年功夫，南明小朝廷就土崩瓦解。弘光是导致南明亡国的罪魁。而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权奸佞臣、阉党余孽，则是助纣为虐的主要帮凶。他们的卖官鬻爵、搜刮金银、选歌征舞、捉拿复社文人，同宦官仇士良之流尽杀朝臣、广选美女、缢死郑盈盈、打击白居易、迫害梁厚本等文人，其阴谋同样奸险，其手段同样毒辣。可以说，从仇士良身上，就能看到阮大铖的影子。作者通过对其罪行的揭露，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愤慨之情，深刻揭示了南明复亡的原因。而这

也正是《小忽雷》的思想意义之所在，正是此剧“演未三旬”，观者已有“移情之叹”^{①⑨}的原因之所在。

三

无疑，在《小忽雷》的正面人物中，郑盈盈可谓光彩照人的形象。然而，她的艺术魅力并不在于其外表之美。虽然，作者曾借剧中人物之口赞其“秀美而文”^{②⑩}，“色艺尤绝”^{②⑪}，但是对此并未过分渲染，只是把她描绘成一个天姿国色的绝代佳人。而是浓彩重笔集中刻画其内在的精神之美。一是忠于爱情，坚贞不渝。当郑注逼其改嫁时，她严辞拒绝，理直气壮；当幸遇梁生时，衷心誓盟“今生不得相从，愿结姻缘于来世”^{②⑫}；当身陷宫禁，危及贞洁时，“甘愿一死”^{②⑬}，决绝反抗；当仇士良扯其“进御”时，她怒不可遏，手持忽雷，血溅仇头。即使即遭缢杀、旦夕毙命之际，也仍念念不忘与梁生“配合姻缘”^{②⑭}。的确是“心如铁石贞”^{②⑮}，“生死不相负”^{②⑯}。二是不畏权奸，勇于斗争。作者着意突出的，是她对宦官权奸反动本性的比较清醒的认识，以及因此而具有的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而这正是她与梁生真挚相爱、矢志不渝的基础，是这位孤苦贫女精神力量的主要源泉。所以她当面顶撞郑注、拒婚仇侄时，断然痛斥权珰，“谄媚行私，教人骂名千古垂”^{②⑰}，有力地戳穿了郑注欲结国戚、稳戴乌纱、甚至不惜“出妻献子”^{②⑱}的齷齪灵魂。她之所以能对仇士良的狐假虎威惯技保持着高度警觉，及时识破其矫诏强宣、坏其贞洁的阴谋诡计，丝毫不怕“扯你见驾”的威吓，在猝然而来的威逼凌辱面前，无所畏惧，从容镇定，“整衣下床，面君力争”，就是因为她知道她与仇士良之间是一场“冤如海样，恨似天

高”的生死搏斗。虽然敌我之间强弱悬殊，但是自己胸怀浩然之气，“自有因由说”。在这“只争今夜”的“生死关节”^{②⑨}，唯有以死抗争，才能保持“冰清玉洁的心肠”、“顶天立地的名节”^{③⑩}。当然，由于自身的局限，她对平淮蔡中仇士良移花接木迫害梁生的内幕不曾得悉，对甘露之变中仇士良杀戮群臣的穷凶极恶未曾亲眼目睹，她没有也不容易直接参予那些政治斗争。但是，她坚贞不渝的性格特点，却是在同宦官头子仇士良及其亲信郑注直接的面对面的矛盾冲突中弥彰愈显的，而这些矛盾冲突又是与平淮蔡、甘露之变等激烈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正是因为梁生平淮蔡中有功，其仇敌才越要将其妻盈盈抢入宫中报复；正是因为甘露之变中仇士良乘机将郑注杀死，所以才借机诛连其妹郑盈盈。梁、郑的悲欢离合，盈盈的“幽闭永巷”“乱中遭缢”，正是与“强藩肆掠”“甘露伏兵”这类政治斗争休戚与共相始相终的。因此，这就把儿女之情与兴亡变乱联系在一起了。从而也就使郑盈盈的坚强不屈誓保名节赋予了反对宦官专权斥责奸佞当道的政治意义。《小忽雷》的整个情节结构就是围绕这一中心思想展开的。

作者把梁厚本、郑盈盈做为矛盾的一方，其支持或同情者为宰相裴度、平章权德舆、翰林白居易、独孤郁、歌妓楚润娘、郑注之妻李氏以及梁生奚童。他们要争得梁、郑男才女貌情投意和的美满爱情，反对宦官专政、藩镇割据。而仇士良为矛盾的另一方，其帮凶为郑注，其靠山却是皇帝。他们要陷害忠良、窃夺朝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在爱情的波折和政局的变乱中形成波浪起伏的戏剧冲突。全剧四十出，除第一出概述剧情外，其余各出，大体均匀地分为四个部分。第二至十一出，是矛盾冲突的酝酿。梁生曲江题壁，结识白、独而延宾相府，引出郑注

附席。由“梁兄清年三五，敢是未娶”“容他日专拜”^⑩，为“梁门攀婿”“代聘联姻”做好铺垫，是为梁郑爱情故事的开端。“争琴起衅”则是双方矛盾冲突的缘起。梁生从此坎坷多难。由是仇士良借“鞫凶”参倒权德舆，排挤白居易，打击独孤郁，致使梁生园林避迹。其间，将罢职司空于颀交通宦官谋图节度之案与仇士良寻隙报复纠葛在一起，这就为后来的“强藩肆掠”埋下了危机的种子，把始结姻缘的梁郑卷入了兴亡变乱的漩涡。第十二至二十一出，是双方矛盾冲突的发展。藩镇吴元济叛乱，使全剧顿起波澜，使双方矛盾斗争转入第二个回合。梁生挟策从军平叛，首立军功，却被仇士良挖补名字，因而堵塞了立功边塞以图仕进之路。而女主人公郑盈盈出场即为拒婚仇侄，是她与仇士良矛盾斗争的开端。拒婚而导致怒倒丹炉，则是她从顺从走向反抗的果决行动，是其坚贞个性首次闪射出火花。这里，作者以生、旦为线，将男女双方遭遇，都贯串在平淮蔡过程中。平淮蔡的胜负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使男女双方命运的吉凶与平淮蔡的胜负成反比例地发展。其爱情纠葛与兴亡变乱结合得比较紧密。第二十二至三十二出，是矛盾冲突的进一步发展。仇、注之流，为邀宠固权而广选秀女揭开了第三个回合的序幕。盈盈被选，禁锢深宫。而梁生认妻遭辱，惟寄希望于科举，却又被仇士良斥去名字，落榜孙山。梁生寒馆评诗，盈盈秋宫拨怨。男女主人公都被阉宦权奸逼上了绝路。然而在夫妻偶逢、生被拆散、各居绝地的孤寂愤懑中，彼此感情却更加笃厚。作者曾分别连用数曲唱出了他们彼此饥思渴念欲会不能愿结来世的一腔衷情。这一部分，把梁、郑爱情的起伏放在朝廷“亲策贤良”与广选秀女、民间速婚的背景中描写，将仇士良的恃威弄权、搅乱朝纲与郑梁的生离死别屡遭欺凌形成鲜明对

比，儿女之情与兴亡变乱依然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三十二至三十八出，是全剧矛盾冲突的高潮。宦官专权，强藩割据，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日益尖锐，导致血书定计，甘露伏兵。而这场白热化的宫廷之争，将剧中所有主要人物都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郑注因而丧生，是其走狗的必然下场，固不足惜。但狡猾阴险的仇士良却反而愈加得势，在屠戮文武百官的同时，又绞杀盈盈，投尸御河。这是宦官权奸对纯洁弱女肆意迫害的极峰。在刀光血影中，在弥漫宫廷内外的血腥恐怖气氛中，全剧矛盾冲突推向高潮，而女主人公坚贞不屈的形象至此亦巍然屹立。至于《钓鱼得配》、《忽雷归主》，梁郑因祸得福，是其爱情继续发展的偶然中的必然。而《鹧子惊魂》，梁郑双被枷锁，则是高潮的余波重兴。结末的《皇帝赐婚》、《平章荐士》，则是矛盾冲突发展的结果。全剧以男女之情与兴亡变乱为纲，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

同时，在全剧中，小忽雷犹如一串明珠之引线，将梁郑与仇士良等诸多矛盾冲突纵横贯串起来。买忽雷与抢忽雷，是双方矛盾斗争的导索；向皇帝献忽雷是仇士良邀宠窃权的开端，而忽雷传到盈盈手中，却成为她抒情达意的工具，同仇士良斗争的武器；小忽雷击破仇头而被损坏，送去修理，梁生复得，成了他与盈盈再结姻缘的信物；因盈盈偷弹忽雷被黄门发现，夫妻双被枷锁，小忽雷又成了他们爱情的“罪证”；结末的皇帝赐配，忽雷归主，它又成了正义必胜的象征。随着小忽雷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串连了整个故事情节。小忽雷成了联系儿女之情与兴亡变乱的媒介。足见作者构思之巧。他确实善于借儿女之情，写兴亡变乱。“这是他一家的作风，特长的技术”^②。

另外，作者还能运用典雅清丽的语言，真实而生动地写出

人物的个性特点。梁厚本的恃才清高，郑盈盈的坚贞刚毅，自不必言。即如反面人物仇士良的凶险狂妄，郑注的趋炎附势，亦相当突出。尤其是曲文的表情达意，更见工力。试看《乌夜啼》一曲：

“檀郎睹面难亲热，好一似梦迷离月被云遮。待近身未语先呜咽。这时节，偷转双睫，眉锁千叠，心系百结，肠又摧裂。那旁人纵是石和铁，也须搥不尽衫襟血！他那里正难决，我这里又遭灭，怕这一番相逢，断送了他少年也。”

既恪守词韵，凛遵曲谱，典雅清丽，又融化古人诗词，纯任自然，含情蓄意，余味无穷。故孔尚任云“今《小忽雷》清词丽句，大似《粲花》。而《秋宫》一折，直夺关、马之席。此道茫茫，斯为绝唱”^③，并非尽是自夸。梁启超曾赞《小忽雷》词曲之美，在于“不事雕琢，纯任自然。无一短钉之句，无一强押之韵，真如弹丸脱手，春莺啭林，流离轻圆，令人色授魂与”^④。亦并非全是过誉。

当然，《小忽雷》只是孔尚任创作历史剧的初步尝试。剧中粗疏甚至纰漏之处，还是显而易见的。女主人公至第十四出方始出场；第二十出之前，男女主人公仅会面一次。因而，他们的爱情缺乏更为坚实的基础，也就削弱了《寒馆评诗》、《秋宫拨怨》两出中彼此深切怀念的真实程度。他如梁生科考之前的绯衣托梦，雪夜出师之前的解说谶语，也都分明含有封建迷信色彩。同时，在情节结构上，人物较多，有些次要人物如刘禹锡、元稹等可有可无，因而也增加了一些不甚必要的过场戏。《青楼访丽》、《掷果街头》、《快聚江船》、《巧遇新亭》等出，意在叙述润娘遭遇，抒天涯沦落、怀才不遇之感，但铺叙太详，不善藏掖，有些喧宾夺主，影响了梁郑爱情故事的集中描述。而宾白中的

个别科诨，如郑注、梁正言谈论服妙剂、做内相一段，也流于庸俗低级。如此等等，说明作者在创作《小忽雷》时，在艺术上还是不甚成熟老练的。

四

我们对《小忽雷》的整理，主要是校勘、标点和注释。校勘，根据目前仅见的三个版本：暖红室本、曲阜师范大学本、山东省博物馆本。后二者均为抄本。曲本两卷，现存校图书馆善本库，经鉴定，确为珍本。首页题为：岸堂主人鉴定 梦鹤居士填词。据此本纸料、字体、款识、印章等，可断为清代抄本。内有印章四方：叙伦堂印、王凤喈印、鸣高、青松白玉。“叙伦堂”为谁？尚待考证。至于王凤喈，清乾隆朝确有一王鸣盛，字凤喈，为经史名家，著述甚多，性喜金石文物，珍藏颇富。他收得《小忽雷》抄本，或自己或令人抄写《小忽雷》，亦有可能。鸣盛与鸣高，音近义同，《诗·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王凤喈与鸣高，似是一人。据云，凤凰非竹实不食，非梧桐不栖，其高洁与“青松白玉”相似。故“青松白玉”与“鸣高”亦似是一人。此抄本虽尚待深入考证，但以之与刘世珩暖红室本相校，其差异却有二百多处。其中，不少处较为合理。如第三十八出，曲本：“（生开门，贴入介，生将身遮旦介，贴）可怎生一个女子，有些面善，是谁？（扯开生，见旦，惊倒介）有鬼有鬼！（旦亦惊倒介）饶我饶我！（小旦扶旦介）有话慢说，不妨事！（生扶贴介）小公公何故大惊小怪？”而暖本将“旦亦惊倒介”却误为“生亦惊倒介”，则与剧情不符，难以讲通。可见曲本确有价值，而且比他本早得多。山本亦有可取之处。因此，我们虽是以暖本为底